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符号学视角下的 跨界翻译研究

王洪林 著

S
e
m
i
o
s
i
t
e

Border Crossing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Semiotics Perspectiv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学视角下的跨界翻译研究 / 王洪林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6

ISBN 978-7-308-19859-2

I. ①符… II. ①王…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00218 号

符号学视角下的跨界翻译研究

王洪林 著

责任编辑 董 唯
责任校对 陆雅娟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859-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前 言

自 20 世纪中叶雅各布森(Jakobson,1959)提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三分法以来,语际翻译研究受到高度重视。此后半个世纪的翻译研究主要聚焦语际翻译,对语内翻译与符际翻译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符际翻译的关注严重不足。在对语际翻译开展系统性研究的同时,符际翻译研究不但没有形成专门理论,相关研究在总体上也欠缺系统性,缺少跨学科研究。语言是符号的一种,且是主要的符号载体。语言符号表意作为主要的符号表意活动,对语言学视角以及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意义重大。然而,语言符号作为一种符号形式,无论如何重要也无法完全取代所有类型的符号。鉴于此,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难以有效应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非语言符号问题,因而从符号学视角审视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以及副语言符号有更强的阐释力。符号表意与翻译活动的意义转换及传达关系密切。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符号表意活动,不只是语言转换,更不是简单的意义转移,而是涉及跨语言、跨符号的意义再生、重新表达与接受。

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号形式,在翻译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实际上翻译活动涉及的符号已超越语言符号本身。即便是所谓的纯语言文本,也会涉及标点符号、字体、字号、文字颜色以及版式等副语言符号及非语言符号。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涵盖语言符号在内的一切符号,符号学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意义,为翻译研究提供跨学科视角,尤其在回应翻译研究中的非语言符号问题时具有重要的阐释力。

近年来,符号学发展迅速,逐步渗透到了各个跨学科领域,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应用层面都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度重视(赵毅衡,2016a;王铭玉,2015;王铭玉,任伟,2017)。符号学研究,尤其是语言符号学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活动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翻译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地借鉴符号学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符号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相互具有借鉴意义,开展两者间

的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实现两门学科的跨学科发展(佩特丽莉,2014)。然而,遗憾的是,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符号学并没有引起翻译研究界足够的重视,其最新研究成果也没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新时代的翻译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视听翻译、本地化、各类数字化文本的翻译等新兴翻译形式层出不穷,新技术在翻译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各类笔译与口译软件及各类手机 app(应用程序)等为日常交流的翻译活动带来了诸多便利。新兴翻译形式的出现既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契机,同时也为翻译职业以及翻译研究带来了挑战。传统的语际翻译显然难以满足新时代翻译形式的需要,同时翻译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语内翻译或者语际翻译。语言符号作为翻译的主要载体发挥重要作用,而非语言符号以及副语言符号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符号学与多模态业已成为翻译研究绕不开的话题,逐步引起翻译学学者的重视。具体而言,如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绘本翻译,语言要素只是绘本的多模态要素中的一种,图画、声音等非语言符号,以及韵律、节奏、停顿、语调等副语言符号对意义建构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除图画外的视觉要素,绘画文本中的字体、字号、线条粗细、字体颜色、版面设计等同样对意义的产生、理解与接受起到关键作用。不同模态的符号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意义建构,翻译活动不得不考虑到多模态符号的特殊性及其在意义生成中的配合。鉴于此,翻译实践的变化对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翻译界学者从符号学视角开展了翻译跨学科研究。比如,在集学术研究著作与教材于一身的最新版《换言之:翻译学教程》(*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中,作者贝克(Baker,2018)采取语言学与符号学双重视角对翻译研究进行了系统性、整合式的跨学科考察,在强调符号对等的同时,对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成果进行了大量引介,进而对符号对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意大利学者佩特丽莉(2014)则从符号解释项视角出发,对翻译中的符号转换以及原文同译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解读与阐发,不乏富有新意的观点。国内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了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有学者提出符号学翻译研究的设想并提议建立翻译符号学学科(王铭玉,2015,2016)。随后,贾洪伟(2016a,2018)对翻译符号学的学科概念、符号分类以及符号转换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有学者借鉴哲学符号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比如借鉴认知差概念,结合中国当前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问题(任文,2017b)。也有学者借鉴符号学理论对影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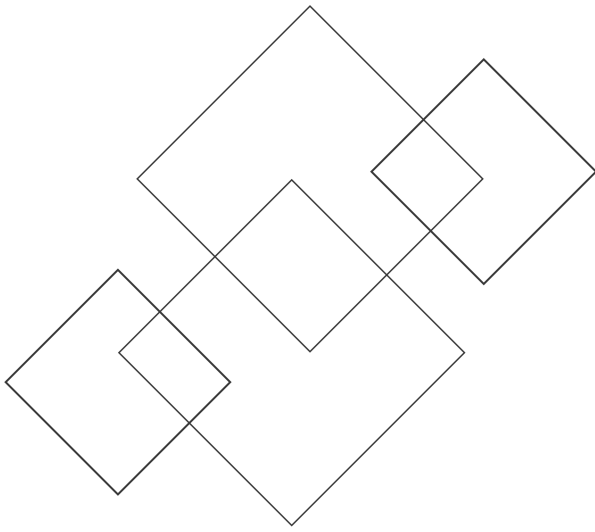
翻译展开讨论。比如,潘琳琳(2018)从翻译符号学视角对《红高粱》的域内、域际以及超域翻译进行了文本阐释。其著作对影视翻译以及多模态翻译研究,乃至跨学科翻译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进行的跨学科探讨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的健康发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跨学科视角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与视界。不过,总体上,翻译研究对符号学研究成果的借鉴远远少于从其他学科(比如语言学)的借鉴。尽管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符号学的设想,也有研究尝试借助符号学与多模态探讨翻译问题,然而,截至目前,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总体上缺少理论性、系统性、整合式的跨学科研究。鉴于此,本书从符号学视角切入,对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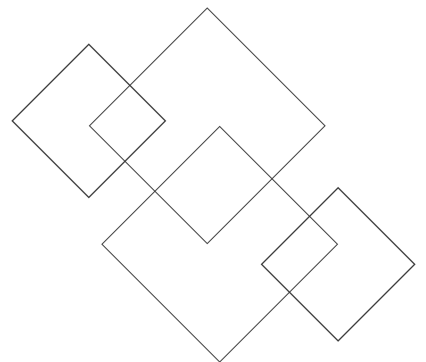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符号学翻译研究概述	5
第一节 符号与翻译	7
第二节 符号学视角下翻译忠实问题的再解读	12
第二章 意义再生与翻译研究	17
第一节 意义理论与翻译	19
第二节 翻译中的意义再生机制	27
第三节 翻译中的无限衍义	34
第三章 标出性与翻译伦理研究	43
第一节 标出性视角的翻译伦理研究	45
第二节 标出性与译者伦理选择	50
第三节 译者伦理的标出性研究	56
第四节 译者伦理研究的焦点与展望	64
第四章 跨学科翻译研究	71
第一节 译者主体、自我与身份研究	73
第二节 译者伦理中的空间与身份	80
第三节 作为表演的翻译:符号学视角	88
第四节 普特南《“意义”的意义》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97
第五节 翻译中的隐含作者	105
第五章 符号学与跨界翻译研究回顾与前瞻	113
第一节 符号学翻译研究回顾与前瞻	115

第二节	符号翻译学与翻译符号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126
第三节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翻译对等问题的跨学科解读	132
第四节	符号学、多模态视角下的绘本翻译研究	140
参考文献	147
附 录	155
附录一:符号学与多模态双重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绘本》述评		155
附录二:符号学等多重跨学科视角的绘本研究		
——兼评《再谈图画》		164
附录三:符号学视角的跨界翻译研究新进展		171
索 引	175
后 记	177



绪 论



本书从符号学视角展开跨界翻译研究,主要包括:对符号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进行介绍,聚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问题;从文化符号学标出性视角审视翻译伦理和译者伦理选择,从隐含作者视角审视翻译问题;对跨界翻译研究进行回顾与前瞻,通过对符号翻译学与翻译符号学概念的界定,厘清两者的关系。本书旨在拓宽新时代翻译研究的视野,并增加翻译研究的符号学及跨学科视角。现将本书主要章节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概述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该章首先聚焦符号与翻译问题,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翻译文本转换以及翻译文本同原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通过对符号定义、符号关系、翻译中的符号等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符号关系,以期为翻译研究提供借鉴。随后对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中的忠实等核心问题进行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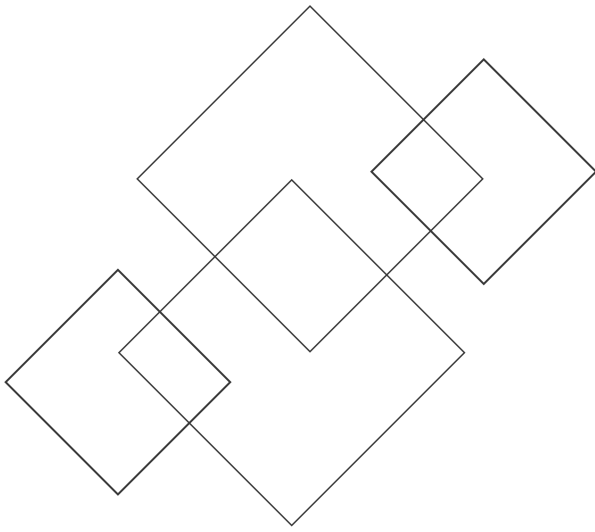
第二章聚焦翻译中的意义再生问题。意义问题是翻译研究的首要问题,该章从不同视角对意义问题进行分析与阐发。首先从语言学、符号学、语言哲学以及翻译研究角度对意义理论的研究入手,着重分析符号学中的意义问题。随后通过建构翻译中的符号表意机制,探讨翻译中的意义再生、符号转换等问题,进而从符号学视角对“信达雅”问题进行诠释与分析。然后对翻译中的意义再生机制展开讨论,进而聚焦翻译符号转换中的无限衍义问题,探讨翻译中符号表意过程中的无限衍义、意义流变等问题。

第三章从文化符号学标出性视角审视翻译伦理及译者伦理选择问题。该章从符号学提出的核心观点出发,探讨立足于符号学又超越符号学的翻译伦理问题。首先对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进行梳理,随后探讨从翻译伦理到译者伦理概念演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同符号学理论的渊源。随后从符号学视角出发探讨翻译伦理以及译者伦理问题,聚焦标出性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译者的伦理选择,着重探讨符号学标出性给译者伦理带来的影响。最后,对译者伦理研究进行展望。

第四章着重分析跨学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该章着重讨论符号学以及其他跨学科视界融合的跨界翻译研究。首先,探讨符号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自我与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从译者视角出发考察译者的主体、自我以及身份的实现路径。紧接着从空间和身份视角切入,对翻译活动涉及的译者身份等译者伦理问题展开讨论,探究译者所处的空间和译者身份以及译者伦理选择之间的深层关系。随后,探讨“作为表演的翻译”在语言学、性属研究以及符号学中的意义,聚焦符号学视角下译者的表演行为,以及翻译作为表演的符号学意义。之后,以普特南《“意义”的意义》一文为例,探讨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研究,重点讨论“孪生地球”假设以及“语言劳动分工”假设与翻译研究的关系,进而分析该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最后,从隐含作者视角对翻译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隐含作者和普遍隐含作者的概念分析,对翻译活动不同阶段涉及的隐含作者尤其是推导作者展开讨论,从而对跨学科翻译研究进行积极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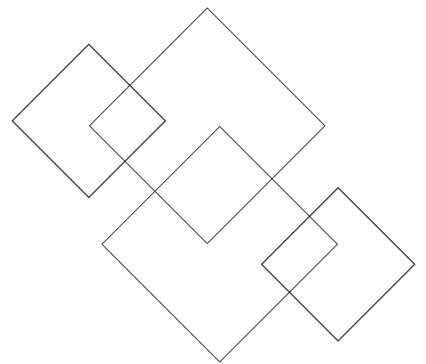
第五章回顾并展望符号学与跨界翻译研究。首先,通过对符号学翻译研究历程的回顾,对未来符号学翻译研究方向进行预测。通过聚焦跨界翻译研究未来发展走向,提出未来翻译研究跨学科力度会更大、整合程度会更高、跨界研究会走向深入。随后,对符号翻译学与翻译符号学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并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视角对翻译对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解读。最后,在数字化、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讨了符号学、多模态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重点讨论儿童文学中的绘本翻译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此外,附录部分对绘本翻译研究、图画等视觉多模态研究以及符号学视角的跨界翻译研究最新进展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其中,附录一通过对《翻译绘本》的评述,从符号学和多模态双重视角讨论了儿童文学翻译问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绘本翻译研究的现状与进展。附录二从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叙述学等多重理论视角对《再谈图画》进行介评,着重讨论了绘本研究现状,从而为绘本翻译研究提供跨学科研究视角。附录三通过对近两年符号学视角翻译研究代表性著作的介绍、分析和评论,系统梳理了符号学视角的跨界翻译研究新进展及未来研究趋势。



第一章

符号学翻译研究概述



第一节 符号与翻译

导语:一个多世纪前,皮尔斯提出了包括再现体、对象以及解释项的符号三分法,对此,意大利学者佩特丽莉从翻译研究视角进行了重新阐发,赋予解释项以新的意义。自雅各布森提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以来,学界对语际翻译的重视远远超过对语内翻译与符际翻译的关注。近年来,翻译界逐步认识到符际翻译的重要性,并开始从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研究。然而,总体上,相较于语言学视角而言,从符号学视角开展的翻译研究依然相对较少,对符号与翻译的关系研究还有待深入。本节以佩特丽莉对翻译解释项的解释为出发点,分别对符号与翻译的关系,以及翻译中的符号进行深入探讨,并从解释项视角出发聚焦翻译文本同原文本之间的关系。

1 符号研究

(1) 符号学

在“当代符号学译丛”总序中,研究者指出,“符号学不是一门新学科,却是近20年来发展最迅速的人文社会学科”,而“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意义的发生、传送、理解,是符号学的基础问题”(霍奇,克雷斯,2012:总序1)。事实上,人们对符号的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瑞士学者索绪尔被看作符号学之父,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影响深远。不过,与他同时代的美国学者皮尔斯在符号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只是其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出版,其研究经后人整理后才显得较成体系。皮尔斯对符号学的研究看似零星,不过近年来学界逐步发现了他的符号学的价值。自20世纪以来,符号学对意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对而言,西方学界对符号学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的符号学研究也愈加系统与深入(季海宏,2011;皮尔斯,2014;赵星植,2017)。

翻译作为特殊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关注的焦点是意义。与普通交际活动所不同的是,翻译的重心在于不同语言符号意义之间的转移与再生。可以说,符号学对意义的研究同翻译研究一脉相承。具体而言,翻译通过意义转换实现原文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再生、传播、理解以及接受。概言之,翻译活动具体探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在意义转换中的具体作用。语言作为主要的符号载体在符号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不过,近年来符号学研究越来越关注非语言符号在意义表达中的作用。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符号,也涉及非语言符号以及

副语言符号在表意过程中的作用,因而从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学界对符号与翻译两者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拓展的余地。

(2) 符号的定义

对于符号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没有达成一致。有学者将符号定义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赵毅衡,2016a:1)。可见,符号与意义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换句话说,“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赵毅衡,2016a:1)。由此可见,符号携带意义,符号因意义而存在,符号是意义的载体,而意义则既是符号存在的前提又是其存在的理据。总之,符号与意义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依存,意义存在于符号之中,而符号本身携带意义。不过,就符号的解释项而言,“意义就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就是意义的实现”(赵毅衡,2016a:2)。意义依赖于解释,而解释激发出符号所携带的意义,意义借助解释而得以表达。换言之,“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赵毅衡,2016a:2)。解释就是释放符号意义的手段与途径。通过解释,意义的潜力得以释放。换句话说,符号的意义在于接收者的解释。

关于意义问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借助符号另外完成。在发出的符号被接收并解释时,必须被另一个符号表意所代替。因而解释就是另一个符号表意过程的起端,它只能暂时搁置前一个符号表意过程,却不可能终结意义延展本身,这也是“无限衍义”活动的缘起所在(赵毅衡,2016a:2)。可见,意义历经发出者的表达,以及接收者的解释两个环节而得以实现。不过,无论是发出者表达意义还是接收者解释意义,都需要借助新的符号。有必要指出的是,符号学研究提出的解释项概念有效拓展了符号表意的延展性。符号解释项的出现,使得符号意义借助解释项而存在。而对符号的解释又不得不采用新的符号,如此一来,符号表意过程出现“无限衍义”。有研究指出:解释项使得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持续下去,不过实践中却可能在具体时间节点中断,但解释项的出现使得符号表意或者无限衍义在理论上不可能被终结(赵毅衡,2016a)。因而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由于借助新的符号参与符号的解释与表达,符号表意活动无限制地延展下去,从而产生“无限衍义”。对于符号无限衍义的问题,本书将在第二章第三节展开详细讨论。

(3) 符号关系

索绪尔提出了符号二分法,即符号包括能指与所指。皮尔斯(2014)提出了

符号三分法,即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与解释项(interpretant)。有学者将皮尔斯提出的符号三分法称为符号意指三分式,并对索绪尔与皮尔斯的符号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指出:符号中的“可感知部分”被皮尔斯称为“再现体”,相当于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不过,索绪尔提出的所指相当于皮尔斯提出的对象与解释项两个部分(赵毅衡,2016a:94)。需要指出的是,“可感知”的对象不一定是物理或者物质层面的个别物体,也可能指不同物体之间的空间,或者时间暂停所造成的间隙。此外,“可感知”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物,也可以是龙、麒麟、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等。只要某对象可以被接收者感知并被认为携带意义,该对象就被称为符号。

皮尔斯(2014)将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看作符号三元,三者之间呈现出具有相似性、指示性、规约性的三种关系。此外,这三种关系是共存的,只是针对具体文本而言,某一种关系可能会起主导作用,另两种关系居于次要地位。可见,皮尔斯的三分法与索绪尔的二分法最大的不同在于解释项。相较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而言,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打破了二元对立的观点,为符号学研究带来新的可能。解释项的提出不仅对符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翻译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翻译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转换活动,符号与翻译自古相伴而生,关系密切。

符号学研究,尤其是解释项的提出,对于翻译这一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翻译涉及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包括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意义的再生、理解、接收等诸多环节。从符号出发探讨翻译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了解翻译活动,有助于对翻译本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2 翻译中的符号

在佩特丽莉(2014)看来,翻译中的符号之间呈现相似性、异质性(alterity)和对话性。而“就语际翻译而论,如果用创造和解释来理解‘信’,而不是仅仅用到对原文的模仿、重复、复制(即另外一种语言中的字面照搬),则‘翻译文本’与‘翻译文本对象’之间必须建立一种异质性关系”(佩特丽莉,2014:209)。“异质性”也称“他性”(otherness),是指某物的存在是有其自身理由的,是自主的,不依赖“我”的动机、意愿、意识或被承认的(佩特丽莉,2014)。这里提到的“异质性”或“他性”是指译文与原文之间还存在的差异。而根据佩特丽莉(2014)的观点,译文和原文之间还存在相似性与对话性。

一方面,译文与原文相似。相似性关系被看作符号的“第一性”关系,也是符号间的主要关系。事实上,原文同译文作为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两者之间存在具有相似性、指示性与规约性的三种关系,但以相似性关系为主。不过,佩特

丽莉(2014)认为原文与译文之间是既相似又不相似的关系。佩特丽莉(2014: 217)指出:“翻译文本和被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相似性的;译作必须像原作。”不过,相似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如果译本与原作完全相同,它就是与原作一样的东西,是同一文本的一个复本,“这就是翻译的悖论,是派生性的悖论。承认翻译可能,就是承认某物可能既相似又不相似”(佩特丽莉, 2014:219)。可以看出,译文在与原文保持相同或相似的同时,又存在不同或差异。相似性是维系译文与原文关联的必要纽带,而差异性则是译文作为译文而存在的主要理据。

另一方面,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对话关系。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相似性,两者进而在相似性基础上展开对话。根据佩特丽莉(2014)的观点,符号与符号活动具有对话关系,符号的意义是解释项对符号的解释,解释项又成为新的符号,从而开展新的符号表意活动。也就是说,对话关系是由符号本质所决定的。符号的解释项是对符号自身,尤其是对符号意义的回应,而译文作为原文的解释项是对原文的回应。如果说文本内部的符号关系是符号内部关系的话,那么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的关系则是元符号关系。佩特丽莉(2014)进一步指出,解释项作为对符号表意活动的回应,赋予符号以意义,从而成为新的符号,引发新的符号行为。符号行为发生的过程就是符号解释过程,也就是符号意义产生的过程。“符号身份要求不断的位移,每次符号解释,它就变成别的,它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符号,起着解释项的作用。”(佩特丽莉,2014:224)这一观点对讨论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符号关系具有重要启示。译文作为原文的解释项,与原文保持对话关系,但同时又作为独立的符号而存在。

综上所述,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相似性,同时保持对话关系。可以说,译文和原文相互依存,没有译文的原文与普通文本没有区别,没有原文的译文不再具有译文身份。由此可见,两者的存在都以对方为依据,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从文本的独立性来看,两者尽管相互关联,但同时又都作为独立文本符号而存在。

3 结 语

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转换活动,与符号表意密不可分。本节从符号定义、符号关系及翻译中的符号等几个方面入手,探讨翻译中的符号问题,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索绪尔提出能指、所指的符号二分法以及皮尔斯提出的再现体、对象与解释项的符号三分法,一个多世纪以来为符号学、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意大利学者佩特丽莉(2014)结合翻译研究,对符号研究进行了拓展,尤其对符号解释项进行了创造性阐发,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其研